

■ 儿童学习与发展

国外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王涪蓉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幼儿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父母情绪回应作为父母情绪社会化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儿童情绪发展有着最直接、最典型的影响。在国外已有研究梳理基础上,分析了两者的作用机制,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情绪理解、情绪表达的关系以及文化与种族、性别、年龄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从脑科学视角深入揭示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同时从家庭系统论视角下探讨两者的多种路径,关注两者动态互动过程,以便全面准确地认识两者的关系,帮助家长建立高质量的亲子情绪回应状态,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发展。

关键词:父母情绪回应;儿童情绪发展;儿童情绪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G619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2)08-0062-11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2.08.009

A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motional Reaction on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WANG Fu-rong

(Schoo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han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ypes of parental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parent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s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typical way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view of foreign studies, we analyzed the mechanis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s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e and race, gender and age. In the future, more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to deeply explor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science, while exploring multiple pathways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ystems theory and focusing on the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elp parents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parent-child emotional response stat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arental reaction;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ren's emotion socialization

20世纪60年代,国外儿童社会化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儿童情绪发展,父母情绪社会化作为儿童情绪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源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所谓父母情绪社会化即父母对儿童情绪经验、表达、调节的观念、目标、价值观在

行为中的反应^[1]。过去六十年间,研究者围绕着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发展开展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一致认为父母情绪社会化对儿童发展的直接影响途径至少包含四个方面:情绪教导(Emotion Coaching)、谈论情绪(Discussion of

收稿日期:2022-04-29;修回日期:2022-06-0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SGH20Y1219);陕西省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前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JD2020Y16)

作者简介:王涪蓉,女,四川通江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幼儿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Emotion)、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eness)、情绪回应(Reactions to Child's Emotion)^[2-3]。其中父母情绪回应是指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随机的情绪表达,父母实时的回应态度与行为。相比较于其它途径,父母情绪回应在日常亲子情绪互动最为频繁,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最直接、最典型的途径^[4]。近几十年来国外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相比较于国外,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本研究拟在梳理国外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国外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调节、情绪理解、情绪表达的影响路径,同时分析两者关系中的典型调节因素。

一、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情绪教养视角

情绪教养视角从亲子互动的角度探讨父母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强调父母的理念、态度与行为对儿童情绪能力的自然养育。其中,以强尼·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的理论构想最具影响力。强尼·戈特曼(John Gottman)团队在元情绪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父母元情绪理念(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即父母对自身及其子女的情绪所形成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思维模式,包含三个核心成分:对自我以及子女情绪的敏感度、接受程度以及教导意识^[5]。该理论模型中,父母元情绪理念是父母情绪回应行为的基础,直接决定着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支持、赞美、认同等互动行为。父母元情绪理念主要有三种类型^[6]:一是情绪消除型父母(Emotion Dismissing),这种类型的父母认为负面情绪对孩子有害,更倾向于采用忽视或者否定等回应方式,以便尽快让孩子远离这些有害的情绪。二是情绪紊乱型(Emotion Dysregulation),即父母无法适应自身和孩子的情绪,不能很好地平复情绪,面对子女的负面情绪,父母自身负面情绪的强度甚至高于其子女。三是情绪教导型(Emotion Coaching),这类父母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和孩子的情绪,并通过多种富有建设性的策略支持儿童的情绪发展。实证研究

证实,相比较于前两种类型,持情绪教导型观念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具有更好情绪社会能力。

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是另一位在父母情绪社会化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者,认为父母的情绪回应通过儿童的情绪唤醒水平这一中介进而影响着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具体而言,父母非支持性的回应会触发儿童焦虑、害怕、生气等负面情绪,使得儿童情绪过度唤醒,进而表现出过度抑制或者失去控制两个极端状态。情绪的过度唤醒使得儿童难以控制自身情绪表达强度、持续时间及频次,进而在社会互动中容易出现诸如过度自我、行为失控等系列问题^[7],表现出较低的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相反,父母支持性的回应能让儿童的情绪适度唤醒,这样儿童更容易摆脱情绪的束缚,也会更专注于社会情境问题本身,以此有效地解决问题。在此理论设想下,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团队进一步界定了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包含鼓励表达(Expressive Encouragement)、情感关注(Emotion-Focused Reactions)和问题关注(Problem-Focused Responses)三种方式;父母的非支持性情绪回应中包含惩罚反应(Punitive Responses)、忽略反应(Minimization Responses)和忧伤反应(Distress Reactions)^[8]。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提出该理论模型以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相比较于非支持性情绪回应,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确实更有利于其子女情绪社会能力的良好发展。

(二)离散情绪理论视角

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ta)以机能主义以及离散情绪理论为基础,将情绪视为一种精神事件。他指出情绪是个体对生物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活动,每种情绪作为连续的存在都有着各自特殊而独特的功能,个体对情绪的处理是个性最突出的部分^[9-10]。个体的情绪处理特征如何统整至个性?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ta)认为早期家庭养育中亲子间的情绪互动是关键。在亲子情绪互动中,儿童某些情绪状态由于高频次的互动而持续被强化,逐渐巩固下来,最终统整至自我意识,成为个性结构的组成部分。而那一些被选择性忽视的情绪状态会逐渐弱化,最终被迫从个体经验中分裂或者抽离。各个离

散情绪在个体成长中均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儿童每个情绪状态在亲子互动中均能得到合适的回应时,儿童的情绪发展将会获得健康的发展。但如果父母有选择性地养育儿童某种情绪状态,不鼓励或者遗弃另一些情绪,这会导致儿童出现两种类型的畸形:一是过度发展,即某种情绪占统治地位;二是发展不足,即某种情绪的缺失。两种状态均会造成孩子个性的某些缺陷或者更严重的畸形如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因此,该理论设想不仅能揭示个体情绪健康发展的过程机理,也能阐述部分儿童情绪适应障碍的发展机制。在此理论基础上,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ta)构建了5种父母情绪回应策略:一是奖励(Reward),如在儿童伤心时给予安慰,孩子害怕时给予支持;二是放大(Magnify),父母表现出跟孩子相同的情绪状态;三是忽视(Neglect),即对孩子的情绪状态故意忽视;四是惩罚(Punish),如父母取笑子女恐惧、不赞同孩子的伤心等;五是轻视(Override),父母对孩子的情绪表现不屑一顾,如告诉孩子不必害怕等^[11]。

与情绪教养视角不同,离散情绪理论视角强调每一种离散情绪对儿童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父母对儿童某种情绪的任何一种回应方式一旦在强度或者频次方面把握不当,均会导致儿童情绪表达的不足或者过度,进而引发儿童情绪发展以及社会适应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对儿童的情绪回应方式中无法界定出最好的回应方式,只有最匹配的回应策略。

二、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的情绪发展

儿童情绪发展包含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情绪理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eness)三大能力的发展。已有研究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

(一)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情绪能力以及社会适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因此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证实了父母支持性回应能够正向预测学前儿童及青少年的情绪调

节能力,而非支持性则相反^[12-15]。具体而言,父母积极的情绪回应通常会让孩子更倾向于使用建设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母亲安慰回应时,4~6岁幼儿面对害怕情绪更多使用建设性的言语策略而非一味地发泄排解^[16]。除此以外,父母积极的情绪回应能够给与儿童充分的安全感,让其更能积极寻求周围环境的支持以舒缓负面情绪,也更加灵活地进行自我调整。相反,当父母消极应对时,儿童更倾向于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团队发现母亲最小化反应和惩罚性反应与学前儿童与1~3年级儿童回避型调节以及不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正相关^[17-18]。另外,父母消极应对会导致儿童过多地压抑自我情绪的表,不会寻求周遭环境的帮助,从而无法有效地自我调节,最终导致儿童出现许多心理问题。比如有研究表明父母对8~12岁儿童非支持性的回应预示着其子女更多的情绪调节失调以及更贫乏的情绪处理技巧,从而导致其心理适应障碍^[19]。另一项研究让大学生回忆儿时父母情绪回应方式,并探讨与当前的情绪调节障碍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支持性反应与其情绪调节困难显著负相关,非支持性回应则显著正相关,其中忧伤反应最为正相关^[20]。此外,一些针对特殊样本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两者的关系。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较于非受虐儿童,受虐儿童的母亲更负面消极应对其孩子的情绪,其子女也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控制紊乱^[21]。

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两者的关系受制于其它因素。比如有研究者发现母亲问题与情感关注的回应方式与4~5岁儿童顺从性情绪发泄(Submissive Venting)策略(哭泣等方式发泄情绪)显著正相关,而与显性的情绪发泄(Dominant Venting)策略(吼叫、捶打等方式发泄情绪)无显著相关^[22]。这表明儿童的顺从性情绪可能会获得父母更正向的支持,从而获得更有建设性的心理发展结果。另外,与问题关注、情感关注两类支持性回应方式不同,鼓励表达这一支持性回应方式在一些研究中似乎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并不具备正向预测效应^[12, 22]。可能原因在于父母一味鼓励儿童表达发泄负面情绪,反而会让儿童失

去控制情绪的机会,难以发展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不过上述研究中儿童情绪类型、父母回应的具体方式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验证。儿童的情绪调节不仅是后天环境塑造的结果,也是其生理性调节能力不断成熟的过程。换句话说,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是环境与自身生理调节相互影响的过程。近几年来,随着研究者们对儿童生理性情绪调节过程机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三者的关系也自然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首先,许多研究证实儿童情绪生理性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迷走神经系统中两个结构的变化实现:一是基线迷走张力(Baseline Vagal Tone),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持注意,以便让儿童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保持放松的状态;二是迷走抑制(Vagal Suppression),即在有外界刺激的环境中儿童对迷走张力的抑制能力。这两个结构到底如何影响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关系呢?妮科尔·佩里(Nicole Perry)等人通过系列研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其研究发现父母支持性回应与4岁儿童迷走抑制水平显著正相关^[23]。迷走抑制是母亲非支持性的情绪回应与情绪调节的调节因素,但对母亲支持性的情绪回应与4岁儿童情绪调节间无调节效应^[24]。同时父母非支持性回应能够预测5岁儿童的迷走神经调节水平,进而预测10岁儿童的情绪调节水平^[25]。另一项针对9-12岁儿童研究发现当父母低水平支持性应对时,那些迷走神经增加的儿童比迷走神经降低的儿童表现出更贫乏的情绪调节技巧。但当父母高水平支持性时,无论子女自身的迷走神经抑制水平如何,儿童均能表现出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26]。这些研究表明儿童的迷走神经水平能够成为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缓冲器。换句话说,父母非支持性回应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能够被儿童自身较强的生理性调节能力缓和,儿童在面对父母消极回应时同样能够表现出较高的情绪调节水平。不过当父母的回应是支持性时,儿童的迷走神经水平对两者的关系并无调节效应。当然,这些猜想同样需要更多的实验验证与理论分析,尤其是儿童生理性情绪调节水平对父母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无疑是研究者今后着力的方向。

(二)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影响

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包含儿童对情绪表达的认知与情绪情境的理解,如对情绪情境的识别、情绪命名与指认、对情绪表达的理解以及混合情绪、情绪语言的理解等^[27]。关于父母情绪回应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的研究颇为丰富。她认为亲子情绪互动是亲子非言语互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父母的消极回应使得儿童在情绪对话中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从而阻碍其子女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而父母的积极回应能为儿童情绪的学习提供很好的机会。在其实证研究中,父母支持性回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积极影响得到了证实,比如父母支持性回应能够正向预测3~4岁儿童对情绪命名、情绪情景识别、情绪诱因、情绪语言^[28-29]以及5岁儿童的情绪表达规则与混合情绪更复杂的情绪理解能力^[30]。不过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在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的研究中并不总是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比如父亲非支持性的回应与4岁儿童的情绪理解正相关,母亲非支持性回应与5岁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正相关^[30]。可能原因在于父母适度的消极回应能让子女更为广泛地感受与认知不同类型的情绪,从而发展出更精细微妙的情绪理解水平,尤其混合情绪认知、情绪表达规则理解等更复杂、更高水平的情绪发展更需要父母富有变化、多元的情绪回应。这一猜想在其它一些研究中也获得了验证。比如一项针对拉丁裔种族的研究表明母亲支持性回应与5岁儿童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相关,但母亲非支持性回应同样没有产生负面作用^[31]。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幼儿气质和母亲非支持性回应对学龄前儿童情绪理解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母亲非支持性回应对学龄前儿童情绪理解不相关且不具有预测作用^[32]。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并不总是如研究者们所预期的仅仅发挥着负面效应,适度的非支持性回应似乎也能产生积极作用。不过如何界定这种“适度”?适度的非支持性回应跟父母情绪回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发生频次等是否相关。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这些问题,以便

全面准确揭示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影响。

(三)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表达能力的影响

关于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表达的关系,罗斯·巴克(Ross Buck)最早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他认为如果父母惩罚回应儿童的情绪表达,儿童便会逐渐学会隐藏真实的情绪,同时其情绪也很容易被生理性唤醒。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进一步指出处于唤醒状态的儿童难以使用合理的技能改变其处境,也无法表达出合适的情绪回应他人,而父母积极的回应可能会帮助其孩子将积极情绪最大化,消极情绪最小化。除此之外,父母的积极回应还能帮助儿童区别不同的情绪以及不同情绪所依附的不同情境。比如对于儿童不下心摔跤表现出的轻微愤怒,父母通常会自然回应。但如果儿童在兄弟姐妹玩耍中表现出激烈的愤怒,父母则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这种差别化的回应可以帮助儿童学会理解情绪表达依附的情境,从而促使儿童学会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表达情绪^[28]。

实证研究方面,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和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等人早期系列研究发现母亲的非支持性反应如最小化、惩罚性等能够引起学前儿童更多高强度的消极情绪表达或者逃避情绪,而母亲支持性的回应如安慰的回应策略与儿童积极的情绪表达正相关。不过近些年来,一些零星的研究发现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表达不仅有着直接的影响路径,也存在其它间接路径。比如一项研究证实了父母对6~19岁儿童情绪表达的认可程度与儿童的情绪表达不仅存在直接相关,同时还能通过儿童对电视角色情绪的认同发挥间接效应^[33]。另外,一项针对4~6岁幼儿的研究考察了情绪类型对两者关系的影响^[34]。该研究将情绪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映自身个性的敏感而不太影响人际交往的诸如伤心、焦虑等顺从性情绪(Submissive Emotion);另一种则是对人际互动构成潜在威胁的愤怒等不和谐的情绪(Disharmonious Emotion)。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儿童气质和情绪表达的倾向性后,父母对4岁儿童顺从情绪关注越多,2年后其子女越容易表现出相同的

情绪,但父母的回应对儿童不和谐情绪的表达频次却不具有预测作用。由此看来,不同的情绪类型对两者关系的走向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数量稀少,研究结论较为零散,今后需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

三、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调节因素

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的理论模型中,儿童年龄、情绪类型、性别、儿童气质等都是父母情绪应对与儿童情绪发展两者关系中潜在的调节因素。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性别、年龄等调节因素。

(一)文化与种族

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经验和期望,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需要接受并服从这些行为准则。由此,个体的行为模式与情绪特点不可避免地有着种族与文化的烙印。而在儿童情绪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所携带的文化与种族基因正是通过其情绪社会化行为自然移植到儿童身上。因此,文化与种族对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实证研究方面,早期几乎所有的研究样本集中于欧裔。近些年来,三者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浓厚兴趣,种族与文化的调节效应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首先,有关欧裔和非裔文化样本中,有研究证实了种族在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调节作用。比如有研究发现对5岁儿童的负面情绪表达持不鼓励态度的非裔父母,其子女的情绪能力与社会能力更好,而在欧裔群体未发现这一关联^[35]。当父母最小化与惩罚回应时,与欧裔后代相比,非裔后代回忆儿时受伤害与羞愧程度要轻一些,而所感受的爱也多于欧裔^[36-3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较于欧裔,非裔子女似乎更适应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其原因在于:非裔在美国社会中曾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奴隶制,遭遇了强烈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其贫困率是欧裔的两倍。在种族偏见严重的环境中,负面情绪的表达意味着侵略和威胁,极有可能招致危险。因此,非裔父母会有意教导孩子减少其负面情绪的表达,从而保护孩子免受种族歧视。埃丝特·里克尔(Esther Leerkes)也指出如果儿童能够认识到

负面情绪表达所带来的消极社会互动后果,那他们会将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视为一种爱与关心,相反欧裔子女则会将其解读为父母对自己的不理解或者不关心^[36]。有关父母积极回应方面,虽然当前一些零星的研究证实了两种文化中父母积极的回应方式存在差异,但尚未有研究明确证实文化与种族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其次,有关欧裔与亚裔文化样本中,同样有少数研究证实了文化与种族的调节效应。比如有研究发现欧裔父母更鼓励孩子的情感表达,而亚裔父母更倾向于压制孩子的情感表达,这导致亚裔子女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困扰^[38]。另一项研究证实印裔母亲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不相关,而欧裔母亲的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问题行为相关^[39]。这些研究预示着亚裔儿童可能同非裔儿童一样,能够对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产生适当的情绪抑制,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总体看来,文化与种族的调节效应仍然需要多样本进一步验证。另外当前研究所选取的种族文化多局限于美国本土的种族文化(欧裔、亚裔、非裔、西班牙裔),未来还需要更典型、更本土的文化种族变量,如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等。

(二)性别

儿童很早便能区分并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表达风格,比如女孩更容易表达伤心,而男孩则更多表现愤怒^[40]。这种性别差异是儿童情绪社会化重要的内容。而父母在亲子情绪互动中无意或有意、微妙或者明确的性别社会化意识对儿童情绪发展中的性别差异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性别对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方面,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父母的情绪社会化在回应的频次、策略以及对某种情绪的接受度等方面的确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但目前仅有零星的研究明确探讨这种差异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比如有研究选取了典型的欧裔文化样本,探寻学前儿童性别在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表达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父母更关注女孩的顺从情绪(Submissive Emotions),对男孩更多关注不和谐情绪(Disharmonious Emotions),因此女孩表达更多的顺从情绪,而男孩表现出更多的不和谐情绪^[34]。其原因在于:在欧裔

文化中女性通常更多倾向于表达如悲伤、焦虑等一些不破坏人际关系内隐的顺从情绪,而男性则更多被赋予独立甚至具有侵略性,更倾向表达愤怒等外显的不和谐情绪。父母观念中这种性别情绪表达差异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儿童,从而让儿童的情绪表达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角色差异。另外,不同性别儿童对父母情绪回应的敏感度也不同,从而导致父母的回应方式尤其是非支持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程度。有研究发现父母非支持性回应能显著预测女孩而非男孩负面情绪的表达^[28, 41]。当父母双方都出现最小化、惩罚回应时,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情感伤害^[37]。这些研究表明女孩似乎更容易受到父母社会化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女孩对人际交往更加敏感,其情绪的发展也更依赖亲子间的情绪互动。

文化所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家庭中父母在亲子情绪互动中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角色分工,由此父母双方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提出母亲在家庭情绪养育中的角色是情绪守门员,其情绪表达的频次、类型多于父亲,更能准确地回应儿童情绪回应,以此加强家庭成员和谐的关系,父亲则更多充当热情的玩伴并厉行纪律的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使得家庭中母亲的情绪回应更能预测儿童的情绪能力^[41]。不过遗憾的是早期多数实证研究仅包含母亲样本。随着对父亲角色独特作用的认识,部分研究开始纳入父亲样本,并且也证实了父母情绪回应的确存在许多差别,其中较一致的区别在于:母亲更加支持性回应子女的情绪,父亲非支持性的回应相对多一些。然而关于这些差异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目前尚未有相关研究明确系统地探讨父母性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随着对父母性别作用力的深入了解,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以往研究的共性问题:仅仅孤立考察父亲或母亲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单独效应,或者将父母情绪回应赋值简单叠加成一个总值。由此,研究者们从家庭系统论(Family Systems Theorists)的视角出发,提出应该将家庭视为一个层级组织系统,家庭中母子、父子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会相互影响,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效应,可能蕴含

着更为复杂的模式。在此视角下,南希·克尔韦恩(Nancy McElwain)提出三种具体作用模式:一是相加模式(An Additive Model),即父母双方相同的反应方式对儿童的情绪发展是累加效应;二是缓冲模式(A Buffering Model),表现为父母其中一方低支持的回应能被另一方高支持的回应缓冲,儿童的情绪发展高于双方高支持回应的儿童;三是分歧模式(A Divergence Model),即儿童受益于父母不同的回应类型。其实证研究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父母情绪回应与4~5岁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关系,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分歧模式^[42]。由于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法无法深入描述家庭系统论下各个变量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瑞秋·米勒-斯拉夫(Rachel Miller-Slough)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法,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提炼出三种作用模式:一是支持模式(Supportive),表现为母亲的高水平支持与低水平的非支持,父亲则是中等水平的支持与低水平的非支持;二是非支持模式(Not Supportive),即母亲略高于平均水平的非支持和低水平的支持,父亲的支持与非支持均为低水平;三是父亲主导模式(Father Dominant),表现为母亲的支持与非支持均为中等水平,而父亲的支持与非支持均为高水平^[43]。与南希·克尔韦恩(Nancy McElwain)的实证结果不同,后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比起分歧模式,父母双方高支持回应下8~12岁儿童社会能力更好。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后者样本年龄更大,同时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且探讨是儿童不同方面的发展。

亲子双方作为情绪社会化的互动主体,父母性别与儿童性别均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目前有部分研究证实双方性别对父母情绪回应的交互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在欧裔、非裔文化中,父亲更容易负面回应女孩的情绪,而母亲更支持性回应女孩的情绪。而父母对男孩的情绪回应有着文化的差异:在欧裔男孩中,母亲比父亲更支持性回应,而在非裔男孩中父亲的支持性回应更多^[44]。不过另一些研究却未发现性别的交叉影响^[41, 4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表明性别的交叉效应还需进一步验证,另外其交叉效应可能受其它因素如种族文化等的影响。

总体说来,性别与父母情绪回应、儿童情绪

发展三者的关系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能力的影响力是否均等亦或哪方更突出一些?父母双方作用的模式是什么?父母的性别差异作用于儿童全部的情绪能力或者某些方面的能力?双方性别是否存在交叉效应?如果存在,交叉效应所导致的儿童情绪发展有何不同?另外目前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集中于3~6岁样本,对于青少年,双方性别又是如何影响两者关系?未来还需大量的研究不断验证上述系列问题。

(三)儿童年龄

随着儿童年龄增加,其情绪表达和调节的策略等各项情绪能力都会呈现新的变化。如果父母能感知到这些变化并据此使用匹配的回应策略,那么儿童就能获得更好的情绪发展,反之亦然。因此,儿童年龄是影响父母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调节变量。目前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3~6岁儿童样本,这一阶段的儿童经历了从简单情绪到混合情绪的表达与理解,其情绪调节的自主与可控性也获得飞速的发展。这意味着父母的情绪回应必须随着儿童的变化加以灵活调整,以便更好地支持其情绪社会能力的发展。不过,目前仅有一项研究详细探讨了上述理论猜想。该研究发现对3~4岁幼儿来说,父母支持性的回应预测其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较少的情绪问题,而对5~6岁儿童,父母支持性回应反而无法促成其情绪社会能力的发展^[46]。另外,有研究选取了5~7岁儿童探讨其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的相关^[47]。研究结果表明母亲非支持性情绪回应能够正向预测5岁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然而对7岁儿童来说,研究结论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父母不同类型的情绪回应可能以7岁儿童为分水岭对儿童的情绪发展有着相反的效果。对于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时期的儿童,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绪回应不同类型对这一阶段儿童有着相反的效果。比如两项针对童年中期儿童的研究表明父母越支持性回应儿童,其子女越无法独立处理情绪,从而表现出贫乏的情绪识别能力^[48, 49]。另一项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儿童研究同样发现父母支持性回应预示着儿童更低水平的情绪社会技巧与更多的问题行为^[50]。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选择从学前期跨至整

个青少年时期儿童样本,以此探讨年龄的调节效应。

四、研究展望

(一)从脑科学视角深入揭示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

虽然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中介作用即儿童的情绪唤醒状态,不过情绪唤醒状态是如何发生发展?这一问题仍然较为模糊。最近帕特里夏·谭(Patricia Tan)通过人类情绪调节的神经活动过程解释了艾森伯格理论模型中情绪唤醒状态的发生过程^[51]。他认为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在于二个部分:一是处理情绪中最突出信息的神经网络(Emotionally Salient Information);二是一些子过程(Subprocesses of Emotional),其中包含自动和隐性情绪调节神经网络(The Voluntary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Networks)。这两个神经网络分别对应着大脑中相应的区域,而突出信息检测对应的大脑区域大部分与之相重叠,这表明这一神经网络是一个整合的区域。该研究者回顾了众多有关父母风格、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神经活动的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了父母的情绪社会化引起了上述三个情绪调节过程相关的大脑神经网络区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从而控制着儿童的情绪唤醒,最终实现了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变化。由此可见,从儿童情绪调节的神经网络基础角度追踪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且颇具前景的途径。今后可借助于日益成熟的脑科学研究技术,加强相关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以此更加清晰地验证两者关系的内在机理。

(二)从家庭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验证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多种影响路径

关于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中,文化、性别、年龄是目前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调节因素。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孤立考察某一个或者两个影响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应。事实上,家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生态集合体,包含着许多子集合体,比如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物质环境等。对儿童来说,家庭中每个子系统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其

情绪发展。因此,未来非常有必要在家庭系统论(Family Systems Theorists)的视角下,进一步验证家庭中多个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应与交叉效应,以此扩展两者关系的多种路径,具体如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父母不同的情绪社会化途径、亲子依恋、家庭成员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质量、物质环境等。实际上,目前已有零星的研究尝试着探寻更多的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路径。比如有研究证实了兄弟姐妹关系对两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效应^[52, 53]。另一项针对6~9岁儿童的纵向研究探讨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是父母非支持性回应对6岁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缓冲器,而对于9岁儿童来说,在高混乱状态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似乎相关性并不强^[54]。

(三)关注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

毫无疑问,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儿童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能动的人,儿童各项社会技能的发展和社会性行为会影响到父亲自身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55]。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最早注意到了亲子情绪互动时儿童的情绪反馈会影响到父母的情绪回应。但遗憾的是过去几乎所有的研究只探寻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单方向作用,忽略了两者的相互影响。最近有研究者选取了3~5岁儿童的样本详细探讨了亲子间积极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对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亲子间积极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虽不具有中介效应,但却发挥间接作用,亲子间积极情绪同步互动的程度可能是父母情绪社会化能否对儿童情绪发展产生效应的作用点^[56]。由此看来,亲子间动态情绪互动的重要性可能远超出研究者的设想,今后可加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Eisenberg N, Cumberl A, Spinrad T L.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8, 9 (4): 241-273.

- [2] Eisenberg N. Findings, issue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emotion socializatio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0, 56(3): 664-670.
- [3]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et al. The Role of the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J].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2): 361-388.
- [4] Denham S A, Groot 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athway to preschoolers'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J].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993, 17(3): 205-227.
- [5] Gottman J M, Katz L F, Hooven C.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6, 10(3): 243-268.
- [6] Katz L F, Maliken A C, Stettler N M.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12, 6(4): 417-422.
- [7] Robins R W, John O P, Caspi A, et al. Resilient, over-controlled, and undercontrolled boys: three replicable personality typ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1): 157-171.
- [8] Fabes R A, Poulin R E, Eisenberg N, et al. The 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CCNE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02, 34(3-4): 285-310.
- [9] Malatesta C Z, Wilson A. Emotion cognition interaction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 discrete emotions, functionalist analysis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8, 27(1): 91-112.
- [10] Malatesta-Magai, C Z.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Its role i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In D. Cicchetti & S. L. Toth (Ed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expressions of dysfunction* [M].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203-224.
- [11] Garside R B, Klimes-Dougan B. Socialization of discrete negative emotion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link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 *Sex Roles*, 2002, 47(3): 115-128.
- [12] Ahmetoglu E, Ilhan Ildiz G, Acar I H, et al.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ttachment to parents: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s a moderator [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 46(6): 969-984.
- [13] Blair B L, Perry N B, O'Brien M, et al.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on friendship quality in middle childhood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4, 50(2): 566-576.
- [14] Cole P M, Dennis T A, Smith-Simon K E, et al. Preschooler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understanding: Relations with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child self-regulation [J]. *Social Development*, 2009, 18(2): 324-352.
- [15] Rogers M L, Halberstadt A G, Castro V L, et al.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differentially predicts third-grade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lability [J]. *Emotion*, 2016, 16(2): 280-291.
- [16] Eisenberg N, Fabes R A. Mother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anger behavior [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94, 40(1): 138-156.
- [17] Eisenberg N, Fabes R A, Carlo G, et al. The relations of maternal practices and characteristics to children's vicarious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J]. *Child Development*, 1992, 63(3): 583-602.
- [18] Eisenberg N, Fabes R A, Murphy B C. Parent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comforting behavior [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5): 2227-2247.
- [19] Sanders W, Zeman J, Poon J, et al. Child 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5, 24(2): 402-415.
- [20] Otwell-Dove R.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Famili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Adult Emotion Regulation: A Moderation Model [D].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2019.
- [21] Shipman K L, Schneider R, Fitzgerald M M, et al.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maltreating and non-maltreating families: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J].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2): 268-285.
- [22] Meyer S, Raikes H A, Virmani E A, et al. Parent emotion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famil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4, 38(2): p. 164-173.
- [23] Perry N B, Nelson J A, Swingle M M,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ernal emotional support and child physiological regulation across the preschool years [J].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2013, 55(4): 382-394.
- [24] Perry N B, Calkins S D, Nelson J A, et al. Mothers' response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and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agal suppression [J].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2012, 54(5): 503-513.
- [25] Perry N B, Dollar J M, Calkins S D, et al. Matern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 emotion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emotion regulation[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0, 56(3): 541-552.
- [26] McQuade J D, Breaux R P. Parent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pre-adolesc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reactivity[J].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7, 130: 67-76.
- [27] Denham S A, Bassett H H, Brown C, et al. "I know how you feel": Preschoolers' emotion knowledge contributes to early school success [J].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2015, 13(3): 252-262.
- [28] Denham S A, Mitchell-Copeland J, Strandberg K, et al. Parental contributions to preschoolers' emotional competenc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J].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997, 21(1): 65-86.
- [29] Denham S A, Zoller D, Couchoud E A. Socialization of preschoolers' emotion understanding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6): 928-936.
- [30] Denham S, Kochanoff A T. Parental contributions to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02, 34(3-4): 311-343.
- [31] Cunningham J N, Kliewer W, Garner P W. Emotion socialization, child emo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gulation, and adjustment in urba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across child gender [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9, 21(1): 261-283.
- [32] Klein M R, Moran L, Cortes R, et al. Temperament, mother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predicting adjust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8, 27(2): 351-365.
- [33] Scherr S, Mares M L, Bartsch A, et al. On the relevance of parents and TV as socializers of 6 - 19 year-olds' expressions of emotion: Representative data from Germany [J].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18, 12(1): 33-50.
- [34] Chaplin T M, Cole P M, Zahn-Waxler C.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expressio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to child adjustment [J]. *Emotion*, 2005, 5(1): 80-88.
- [35] Nelson J A, Leerkes E M, Perry N B, et al. European Ame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emotion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relate differently to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3, 22(3): 485-498.
- [36] Leerkes E M, Supple A J, Gudmunson J A. Ethnic differences in women'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parental non-supportive emotion socialization [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14, 50(5): 435-446.
- [37] Perry N B, Leerkes E M, Dunbar A S, et al. Gender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parental punitive and minimizing emotion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J]. *Emerging Adulthood*, 2017, 5(2): 83-92.
- [38] Le H N, Berenbaum H, Raghavan C. Culture and alexithymia: Mean levels, correlates and the role of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s [J]. *Emotion*, 2002, 2(4): 341-360.
- [39] McCord B L, Raval V V. Asian Indian immigrant and white American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child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6, 25(2): 464-474.
- [40] Fivush R, Brotman M A, Buckner J P,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 - child emotion narratives [J]. *Sex Roles*, 2000, 42(3): 233-253.
- [41] Denham S A, Bassett H H, Wyatt T M.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eschoolers' emotional competence [J].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0(128): 29-49.
- [42] McElwain N L, Halberstadt A G, Volling B L. Mother- and father-reported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quality [J]. *Child Development*, 2007, 78(5): 1407-1425.
- [43] Miller-Slough R, Zeman J L, Poon J A, et al. Children's maternal support-seeking: Relations to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responses and children's emotion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6, 25(10): 3009-3021.
- [44] Brown G L, Craig A B, Halberstadt A G. Pare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socialization behaviors vary by ethnicity and child gender [J]. *Parenting*, 2015, 15(3): 135-157.
- [45] Shortt J W, Katz L F, Allen N B, et 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isk and psychopathology: Mother and father socialization of anger and sadnes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6, 25(1): 27-46.
- [46] Mirabile S P, Oertwig D, Halberstadt A G. Parent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When is supportiveness no longer supportive?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8, 27(3): 466-481.
- [47] Nelson J A, Boyer B P. Matern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emotions and chil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Different relations for 5, 6, and 7 year olds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8, 27(3): 482-494.
- [48] Dunsmore J C, Her P, Halberstadt A G, et al. Parents'

- beliefs about emotions and 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parents' emotions [J].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009, 33(2): 121-140.
- [49] Castro V L, Halberstadt A G, Lozada F T, et al. Parents' emotion related beliefs, behaviors, and skills predict 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emotion [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5, 24(1): 1-22.
- [50] Castro V L, Halberstadt A G, Garrett Peters P T. Changing tides: Mothers' supportive emotion socialization relates negatively to third grade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in school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8, 27(3): 510-525.
- [51] Tan P Z, Oppenheimer C W, Ladouceur C D, et al. A review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behaviors and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 in youth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0, 56(3): 516-527.
- [52] Yaremych H E, Volling B L.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mothers' and fathers' emotion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 within-family perspective [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18, 190(2): 1-15.
- [53] Shewark E A, Blandon A Y. Mothers' and fathers'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 within family model [J]. *Social Development*, 2015, 24(2): 266-284.
- [54] Hong Y, McCormick S A, Deater Deckard K, et al. Household chaos, parental responses to emotion, and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J]. *Social Development*, 2021, 30(3): 786-805.
- [55] 李艳菊, 连佳璇. 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能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十个月的追踪研究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2): 19-27.
- [56] Lunkenheimer E, Hamby C M, Lobo F M, et al. The role of dynamic, dyadic parent-child processes in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0, 56(3): 566-577.

[责任编辑 王亚婷]

(上接第53页)

- [16] Salmon C A, Hehman J A.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Sibling Conflict and Siblicide [M]. *The Evolution of Violence*, 2014.
- [17] Furman W, Lanthier R. Parenting Siblings [M]. *Handbook of Parenting*, 2005.
- [18] Dawson A, Pike A, Lauren Bird. Parental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Family Relationship Mediators [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5, 24(4): 379-393.
- [19] Brody G H, Stoneman Z, Gauger K.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s, Family Problem Solving Behavior,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ibling Temperaments [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3): 1289-1300.
- [20] 查小青, 杨丹, 查曼, 等. “二胎政策”下的同胞关系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1(3): 18-21.
- [21] Riordan D V. Interbirth spacing and offspring mental health outcomes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2, 42(12): 2511-2521.
- [22] 刘庆. 亲密与隔阂: 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及其调适 [J]. *南方人口*, 2019, 34(5): 36-45, 68.
- [23] Buist K L, Deković M, Prinzie P.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3, 33(1): 97-106.
- [24] Barroso M M. Social Perceptions of Siblings' Sexual Composition: Evidence from Portuguese Youth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11, 42(5): 687-702.
- [25] 沈静怡. 二孩家庭中家长对大孩教养方式的调查研究 [D].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责任编辑 李亚卓]